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建构新时代的英雄话语

——笔谈『新生代』军旅小说

徐勇：进入新时代，呼唤有着新气象的新人新作出现，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共识和热望。这也是军旅文学亟待突破的方向。军人形象的塑造、英雄话语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始终坚守、勉力张扬的重要向度。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军旅文学中也出现了某种“远离崇高”“淡化英雄”，将军旅生活过度日常化甚至庸常化的写作倾向。过度沉溺于日常经验并将这种审美判断上升为圭臬，会极大弱化军旅文学自身的传统和特质，不免令人忧心。

进入新时代，种种新情况、新经验、新命题层出不穷，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亟待军旅文学进行持续跟踪、正面强攻、鲜活呈现、深度表达，这是时代赋予军旅文学的使命荣光，也是军旅文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新生代”军旅文学之所以谓之“新”，恰是与新的时代经验和新的文学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生代”军旅作家是军旅文学的中坚和希望，他们的写作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的文学资源。这一作家群体已经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关注，对存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趋向，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王冰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写实”与“新历史”这两股文学思潮改变了文坛风貌，对军旅文学也产生了持续且深刻的影响。进入21世纪，军旅文学在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处理上基本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而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方面，则大多沿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这两种思潮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其功过是非尚待考量与检验，但是对于军旅文学而言，其影响未必都是积极正面的。军旅文学在吸收借鉴新的文学、文化思潮与表达方式时，不能放弃主体的传统与立场；在战争书写中尝试创造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的同时，亦不能放弃对社会、历史意义及战争性质等基本价值判断的坚守。

具体落实到中国的语境，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始终是被动地卷入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中国，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何曾有过半点选择的自由？在书写战争历史的时候，除了普遍的人道主义情怀，还需要考量战争的性质，需要联系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尤其不能忽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义诉求。那么，军旅作家在考察及想象战争时，更需要明确自己的位置与立场；对于战争的性质与本质，应该有着更为深入且清醒的思考。将西方战争文学中“反战”主题不假思索地搬用到严酷的中国战场中，不过是在用他人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容易陷入错位表达与主体丧失的窘境。

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西元一直坚持对20世纪的中国战争历史进行正面强攻。从甲午海战、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他视野开阔，且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巧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突破。虽然在小说形式层面屡有创新，叙事也多取民间与个体视角，但是西元拒绝将战争历史作虚无主义的处理，对战争进行深入的、带有形而上意味的思辨是他一直坚持的写作伦理。他笔下的战争场面及战争中的人都体现了一种悲壮的崇高美学特质、一种毫不妥协地抗争与搏斗的精神，文本充盈着荡气回肠的崇高之美。如果说以“新历史”“新写实”为代表的叙事潮流是一个文化解构的过程，那么西元的军旅小说写作就是一个重建宏大叙事与总体性意义的过程。但西元的困境也是明显的，困扰他的是始终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思想”与“语言”，无法将战场上那些悲壮英勇的事迹表达得足够令人“理解”与“相信”，也就是说，缺乏一种将理念“自然化”的方式。

军旅文学要保持足够的自信和定力，对于某种流行的文学思潮不加批判地模仿、借鉴，会让作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或是被一地鸡毛式的庸俗细节绑架。对于关涉国家安全与历史理性的军旅文学而言，这样的倾向无疑是令人担忧的。

郝朝帅：近年来，中国军队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训练模式、力量编成、武器装备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新变化都给“新生代”军旅作家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经验和创作题材，当然，这同样也是严峻的挑战。对于“新生代”军旅作家而言，怎样写出日新月异的军旅风貌，怎样表达当下军人的精气神，需要从价值判断到创作方法论的全面更新。

整体而言，“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习惯从微观的个人视角来重新审视事件和人物。这样的文学精致、细腻，对小人物的书写较为充分、到位。而当他们将目光转向宏大历史时，更多的是以个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为支点来编织故事，这种创作取向难免会存在与地方文学高度同质化的问题。对于军旅文学来说，疏离“宏观”，只注重“微观”，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学生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元的创作就非常值得关注。对于军人使命、民族心理、国家尊严等命题，西元总是有着急切的表达欲望。情之所至，有时候在小说文本中，甚至会让人物以密集的抒情和议论来表达作家自己丰沛的思考。在如此宏观的创作预设下，西元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的身份和命运仍然有着足够的观照，打通了集体主义大叙事与个人化小叙事之间的鸿沟。

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对于军旅文学，宏观和微观从来不应该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军旅文学从来都不只是提供审美观照，展示个人在军旅、战场中的命运，它更是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立传，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提供坚定的信心和奋争的勇气。越是在今天的和平时代，越是需要英雄主义来砥砺民族精神，守护国家的尊严和个人的幸福。

程振红：整体来看，“新生代”军旅作家与其前辈作家创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如，朱旻鸢的《斜坡》中，对“许三多”式的小人物林先飞军旅生活的叙述；曾皓的《连长树》中，对擅长厨艺的连长的刻画；曾剑的《穿军装的牧马人》中，孤寂的“我”与老狗和马相伴的故事等等。尽管早在1980年代后期，刘震云的《新兵连》，已经对军营生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但军人日常生活叙事的普遍化和常态化，是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小说中才得以集中显现的。二是英雄叙事的普遍缺位。如，王棵《长音》中，“二十年后再相会”的几个心绪复杂的退伍老兵，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差别；裴指海《高人之死考》中，“高人”并不是英雄，而是一个悲剧性的小人物，在“小说一开始就死了”；曾皓《追赶影子的将军》中落寞的将军与自己的影子对话，从其身上也看不到英雄的光环。可以说，“新生代”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的缺失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凸显恰为一体两面。

有批评家认为“新生代”军旅作家“不应该沉溺于‘底层叙事’，要有整体观和大气象”，其作品“过分抽离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与地方作家作品的同质化，难以形成独特的品格。”应该说，这种批评声音恰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新生代”军旅作家们将笔墨聚焦于日常生活叙事和“底层叙事”？为何在他们的作品中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较为薄弱？另外，需要追问的是，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英雄主义？英雄主义该以何种样貌在当前的军旅文学作品中呈现？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而言，在一个以网络文学为表征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如何超越庸常生活，想象崇高并重建英雄话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新生代”军旅作家着力于表现日常生活其实并无不当，毕竟这与他们的个人经验更为切近，写起来也更得心应手。相比于一些读者对军旅文学中英雄书写的推崇，笔者对“新生代”军旅作家塑造更多个性鲜明的硬汉形象抱有更高期待。“新生代”军旅小说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在侧重日常生活书写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前者完全可以通过塑造有刚性、有血性、明辨是非、意志坚定、有正义感而且面目清晰的军人形象，通过展现雄浑、阳刚的美学风格，呈现出与后者截然不同的格调。

如果进行深入考察，“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局限于日常生活，而是表现出了多样化的风格。以战争书写为例，朱旻鸢的《证明》中，以一张“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作为线索，小人物赵福生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惨烈的战斗经历也因为“证明”的“在场”而更添悲壮意味，小说巧妙地用“证明”来映衬个人遭遇，很有深度。在曾皓的《篝火燃烧的地方》《如烟》等小说里，在大家闺秀敏感而细腻的情感体验中，一段如烟岁月徐徐展开，而抗日战争的背景不动声色地浮现其中。裴指海的《裴》则近乎生猛地撕开了小人物彪悍人生的面纱，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在与敌人的恩怨情仇中动荡浮沉。同样是书写战争历史，上述三位作家的着力点和叙述策略都有着显著差异。因此，在“新生代”军旅作家这一共同的标签之下，在共性之外，这些作家的写作也有着不同的个性。

“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的创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的作家在不同时段的作品还呈现出多变的样态。“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接受过军队院校的系统教育，有着部队基层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也可以直接转化为他们的写作资源，成为其创作优势。当然，作家们完全可以放眼更广阔的天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生代”军旅作家人生阅历的增长和文学视野的进一步拓展，“新生代”军旅小说也必将展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和更多的可能性。

志在蓝天（中国画） 陆千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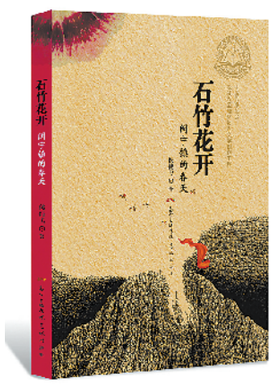
闽宁之花

——“吊庄”移民中的女性群像

■侯健飞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第一次听到“吊庄”这个词，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吊庄”的本意是指，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有一户人家走出去一个或两个人，他们一般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当他们找到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就开荒种植，然后就地挖窑洞搭窝棚，建立一个仅供暂栖的家。这与过去走西口或闯关东的一去不返不同，一户人家居住在两处，主劳力“吊”在两个地方，这样，“吊庄”就成了移民文化中的一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吊庄移民工程”——就是把一个或多个不适宜生存的行政村、自然村，整体迁移到适合生存并可持续发展的地方。虽然这样的移民村很快会有正式名字，但“吊庄”却在民间和官方的记录里都留存了下来。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军旅作家有责任有义务记录和书写这伟大的、持久的艰苦奋战——七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的战役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花城出版社），是我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约创作的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20世纪80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些农民为了吃饱肚子、改变命运，怀揣梦想自发来到银川市永宁县境内的贺兰山东麓，通过在戈壁滩上开荒等方式求温饱、找出路，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聚集区。1990年10月，又有一批异地搬迁的“吊庄”移民来到这里。1997年，国务院确定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简称（闽、宁）命名的移民开发区随后成立。贺兰山东麓先有闽宁村，后改闽宁镇，20多年后，一个崭新而生机勃勃的移民小镇在西北高原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2019年10月中旬，我第一次赴宁夏永宁采访。县扶贫开发中心给我介绍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一位知识女性刘亚明。

刘亚明，1956年生人，现为银川市级非遗传承人。2014年暑期，当时在银川大学任教的刘亚明来到闽宁镇原隆村，向36位待业妇女传授编结钩织技能。这次一个月的教学过程，使她和原隆村结下不解之缘。2017年春节之后，冒着寒风、带着行李的刘亚明应学生之邀，再次回到了原隆村，申请成立了宁夏昱嵘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在村委会文化站的教室里，她开讲为期40天的软陶首饰制作课，60多位村民挤满了教室。因交通不便，她自己购买了电动三轮车，自己制作并购买回教学用品，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帮扶工作中。后来，她说服了家人，自己干脆放弃大学的教职，一头扎进了原隆村，把扶贫工作当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刘亚明说：“原隆村只是闽宁镇多个移民村中的一个，但它是农村贫困的一个缩影。农村人家的穷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人。这个‘穷’一方面是物质层面，一方面指思想文化。我希望用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村里的女性通过学习手工掌握一门技能，能够有知识、有文化、有见识。总之，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要更有尊严地好好生活。”

三年间，在原隆村，参加过各种手工艺技能培训的女工达到了1000多人。刘亚明不但向农村妇女教授手工技能，还以忘我的精神鼓舞感染着身边的女人们。她每天来授课，往返路程有60多公里，早出晚归，代步工具是一辆电动三轮车。2017年的一天，她讲完课返程途中遭遇车祸，腿部严重受伤，留下了病根儿，可她依然克服困难坚持着。如今，村里的文化气息越来越浓，打牌、说闲话的人少了，来培训班学习技能的人多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升了，大家都认为勤奋劳动最光荣。2017年4月，永宁县组织桃花节，女工们第一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参加。2018年9月，刘亚明带着女工去参加全国旅游商品大赛，一举拿下两个项目的入围奖和一个项目的铜奖，让女村民们创作的产品登上了大雅之堂。

要创作出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家必须脚踏实地深入生活，必须塑造好人物形象。在《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一书的开篇，我就写了刘亚明老师的故事，题目是《心手相传原隆红》。两次赴宁夏采访，前后历时40多天，打动我的故事几乎都是女性奋发图强的故事——细碎、微小、曲折、温暖……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女性对于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写好女性人物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塑造好“吊庄”移民中的女性群像，这就是我第一次赴宁夏采访后确定的创作思路。

“闽宁镇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扶贫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我没有采用主题创作惯用的“全景式”创作手法，而是着重写好一个个具体的故事，通过十几位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底层女性，讲述了曲折动人、震撼人心的移民故事，讲述了西北女人的坚韧与自强。这些女性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也是生活的勇者、命运的强者。这本书的书名来自于石竹花。这是一种看似平凡的小花儿，象征着母亲和母爱，寄托着思念母亲、敬爱母亲的感情。石竹花虽然艳丽，却不张扬，不欺邻；紧紧贴住大地生长，可以独立，也可群居；耐严寒，抗风雨，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不离不弃。

近日，讲述宁夏闽宁镇移民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山海情》正在热播，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追剧。有观众说：“自己都不明白，荧屏上那些土里土气的人物咋就吸引了我。”我要说，正因为这土里土气的生活，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和土地、和粮食息息相关，和山与海的血浓于水息息相关。我想起在闽宁镇采访的日日夜夜，恰巧与电视剧《山海情》的主创人员同住一家宾馆。我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创作手法，向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表达同一种敬意。我想，《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之所以能获得“《民族文学》2020年度奖”，也正是因为书中传递出了浓烈的时代气息、家国情怀和人性光芒。

山海情，象征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厚的情谊；而石竹花，则象征着本书记述的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群体。她们中有扶贫驻村的干部，有几十年如一日进行乡村调查的教授，有靠双手致富的农民，也有靠理想信念成功的作家……现如今，有更多贫困地区的民族兄弟，异地搬迁到了闽宁镇。这个昔日的“吊庄”，已经成长为一棵枝叶繁茂的青春树，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

写出典型人物的深度与风采

——评长篇报告文学《心中的旗帜》

■汪守德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傅宁军的长篇报告文学《心中的旗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书写的是江苏省如东市电力系统一支由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故事。作家以质朴而富于温度的文字，讲述了队员们20年来不懈奋斗、追求与奉献的心路历程。读后，我们会被队员们的动人事迹和人性光辉深深感动。

作品以五个章节、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先后叙述了“共产党员服务队”四任队长缪恒生、刘跃平、顾海峰、郭鹏的事迹。电力联系着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供电系统的运行与维修是一种极其琐碎、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工作中积累的“老大难”问题，首任队长缪恒生率先打出了“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旗帜，他将军旅生活中养成的良好作风、坚强意志、一心为民的自觉意识带到了这个新的“战场”，以军人的标准与方式面对艰难险阻，带起了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队伍。在随后的20年间，虽然队长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支由共产党员和复转军人为主体组成的队伍，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理想，将“共产党员服务队”这个人们交口赞誉的响当当的品牌接力传承下去。

精准的描写和精到的语言，使得《心中的旗帜》充盈着可信的力量。作品以动人的细节和感人的故事来反映生活的深度，描摹典型人物的形象和风骨。我们从书中能够看到队员的用心与智慧、艰辛与不易、品行与节操。他们制作“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标识挂在胸前，供社会监督；对外公布报修电话，响铃三声必有应答，而且随叫、随到、随修，从不推诿；夏天的电缆井憋闷难耐，队员们以高效率的抢修，保障城市的电路畅通；高温天气抢修，他们不脱红色马甲，被问起时答道：“如果脱下红马甲就好像战士脱下军装，浑身不自在”；医院突发停电事故，队员们迅即赶到排除故障；免费为贫困户维修、更新老化的线路，对生活困难的群众还主动帮扶，他们点亮的是灯也是生活的希望……可以说，他们是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初心，以军人作风为标准，救急解困，安全周到，尽心尽责，从而深受人们的信赖和赞扬，树起了一面不褪色的旗帜。

作者以平实的视角切入生活现场，书中讲述的故事，看似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近二十年坚持下来就意味着了不起。他们的身上，体现出强烈的英雄气质。事实上，队员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难处和烦恼，但他们用实际行动超越了这些困难，进而达至了更加高蹈的人生和精神境界。傅宁军的笔触并非是单一的美化，而是用非常质朴的、本真的文字写出了队员们的精气神，让读者感到这些人可敬、可信、可学。

傅宁军是一个专注、用心且沉稳的报告文学作家，其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真正深入扎实的采访。如果不去不厌其烦、一点一滴、穷根究底地采访了解，是很难获得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打动人心的故事的。有了对采访对象的深入了解和细致体察，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就具有了真实可感的质地与温度。作者力避编造、拔高，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记叙，诸如队员和家属的关系、队员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出现的那些矛盾，以及用户的期待、不满、议论与叫好等等，这些生活的流态在作家笔下自然流淌。包括队员们周到的服务获得客户满意的好评，都一如生活本身一样真实与自然，这些都体现出作者诚挚的态度与深厚的笔力。

文艺评论

长征 第5103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7时32分 印完8时52分